



-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总体思考
- 两个转变的理论和决策的开拓
- 两个转变的进程及其估量

第一章

两个转变的理论和 决策的开拓

改革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有人譬喻为鸡与蛋 谁生谁 像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形成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循环。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帷幕拉开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期 捷报频传 凯歌高奏。正如《纲要》所说 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 特别是近 17 年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和逐步推进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没有前人的经验，这条路全靠自己的摸索。所以在改革之初，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有所跋涉之后，要不要择定一个目标，

曾经有过争论。有人认为，由于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改革不可设计，也无需设计，或者只能“边设计、边施工”；有人认为，要搞总体设计，如果没有可供实施的总体方案，而走一步看一步，会使整个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失去平衡。这既说明了拟定总体设想的艰巨性，又确实说明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目标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意味着，择定改革目标，一则有利于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二则有利于坚定改革的信念，防止改革中的动摇；三则有利于抓住根本，排除细节的干扰。

至于选择什么目标，先后有过多种方案。起初，有的坚持计划经济，有的提出商品经济，也有的提出市场经济，更多的赞成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结合又有不同含义，表述为计划商品经济、计划市场经济或商品计划经济（区别于原来的产品计划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10 周年前夕，1987 年底到 1988 年夏，国家体改委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设计中期（1988—1995）经济体制改革规划时，大致有几种不同思路，包括“市场—价格改革中心论”，“企业—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企业—所有制改革和市场—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同时推进论”，“整体协调改革论”，“宏观体制先行论”等。^①此外，如“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论”，也流行一时。各种思路的共同点是走出纯计划经济，扩大商品经济或引入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点。可以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基本上采取了市场方向，这是对头的。

我们主张选择一种目标模式。当时，不少人对“模式”的说法不太理解，往往误解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或依样描画的模特，类似于“样板”。其实，模式无非是“类型”、“形态”、

^① 《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 1988 年版。

“形式”的意思，只是研究和分析的工具，是从具体的经济体制中排除了细节而得到的理论抽象，是对某一种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定性的概括，是指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运行机制的总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根据所有制结构、决策结构、调控结构、利益和动力结构以及组织结构五个方面的特征，我们曾经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体上分为五种模式：

1. 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模式 这是一种完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实物分配型经济，其目标构想是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大工厂，这种模式只能在战争和经济封锁等异常条件下实行，有很大的特殊性、暂时性和局限性。

2. 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 基本上就是我们曾经实行过的那种体制，其特点是宏观经济活动和企业日常活动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借以实现的基本方式是以行政权力等级结构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与前一种模式的区别在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活动决策权基本上是分散的。

3. 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 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但将部分微观决策权力下放给企业，如计划外产品有一部分可以自销，有一部分利润可以由企业留用于发展生产和奖金福利等等。与前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扩大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开始注意了运用价格、利润、工资、信贷等经济杠杆，但是仍旧坚持集中计划经济的原则。

4. 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是在计划的指导下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等方面有了更大的松动。其特点是宏观经济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家，企业日常经济活动则基本上自行决策，使国家的宏观计划决策通过微观的市场机制来实现，从而使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模式下，传统模式的弊病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主要困难则在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发挥两者的作用。

5.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其特点是宏观、微观以及家庭和个人三层经济活动的决策都分散化，市场调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普遍的和主导的作用，然而国家既不直接管理经济，又缺乏必要的调节、控制手段。

通过比较，从我国当时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条件出发，主张近期内继续采取上述第三种模式的某些办法作为过渡，那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比较彻底地破除旧体制的弊病，应当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为进一步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准备条件。^①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在经济特区的调查、研究和咨询中，我们对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排头兵的深圳经济特区，主张“经济运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从特区经济的运动形式来看，市场调节是主要的，计划指导是辅助的”。^②对海南岛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建议“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认为“既有区别于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刘国光主编：《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香港经济导报社1985年版，第38页和179页。

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能吸收融合其一切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其他经济特区的‘市场调节为主’向前推进一大步。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与国际市场的运行机制、运行方式协调一致”。^① 后者的基本框架是：多元化的微观基础（指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股份化的企业组织，全面化的市场体系，开放化的价格形态，间接化的宏观调控以及多样化的分配方式。^②

以上讲的是有关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探讨。改革理论的进展，源于并推动改革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中的改革目标是逐步明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4 年 10 月

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在此阶段，农村改革首先突破。农民、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经济决定全局的大头。传统体制的弊病，其实在农村表现得最为典型。从所有制的‘一大二公’指令性计划的安排生产、产品的非商品化和非市场化（统购统销）到分配的平均主义，支配了整个农村经济，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改善不快。推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基本上转变了上述体制格局，迅即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的初步胜利，为计划经济打开一个大缺口，开始容纳商品经济的成长，不仅鼓舞了亿万农民，使广大干部解放思想，并且也为整个改革树立了榜样和信念。

在此阶段，城市工商业改革也跨出了第一步。放宽政

刘国光主编，李京文、沈立人副主编：《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8 页。

②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内刊），1988 年第 38 期。

策，逐步发展了一批集体、个体和私营、合营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部分自主权，提出“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构想。同时，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另外，在流通领域，提出“三多一少”（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和减少流通环节）。还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些，虽然带有探索性，但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上开创了新局面，为整个改革开了一个好头。

这几年的初步改革，从总体上看，由无所不统的计划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①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不作计划的市场调节三种管理方式。当时，一般理解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市场调节是一种经济机制，故有主、辅之分。这种用语，虽然还停留于传统体制，但是已经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历史地看，是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步骤和决定性转折。以此为起点，改革就会继续朝着市场目标前进。

2. 第二阶段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底

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在总结改革初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期的经验后，第一次制定有关改革的目标、方针、原则和实施途径的蓝图，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公布，标志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由局部试点进入全面推开。这个文件与以往的文件相比，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进一步突破，集中表现在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进而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这一确认，一举破除了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计划同市场的对立论，从两者之间的主辅论变为统一论。虽然，后来有过一些理解上的分歧，有人仍旧强调计划是主导，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落脚到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在于以公有制为基础。《决定》还提出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关键是价格体系改革，以及土地、矿山等也是商品等。

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这次大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超出了单纯的计划体制改革的范围，从探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两者的关系。“十三大”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了两个不等式：一是利用市场调节不等于搞资本主义；二是计划调节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从1988年第四季度起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有所加强，改革步伐有所放慢，但是市场取向的目标没有变。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几次重要讲话中，继续肯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此阶段，各项改革逐步开展，并有不少新的探索，促

进了经济发展，配合了治理整顿，支持了对外开放，并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

3. 第三阶段从 1992 年到 1995 年

1992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以这次谈话为标志，表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掀起了又一轮新高潮。谈话中的一个耀眼的亮点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多数学者感到，市场经济已是呼之欲出了。到了 10 月召开党的“十四大”江泽民作报告 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他在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明确这一目标，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深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以认为，经过 10 多年改革的实践和探索，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不是说，过去的一些提法都是错了或岔了；相反，正是经过这些步骤，才能得到此一正确的结论。

接着，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对改革目标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计了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建立计划、金融、财

税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的清晰，加快了改革步伐。1994年出台的改革项目很多，所谓“五大改革”实际上不止，有金融、财税、投资、外贸和汇率、物价、国有资产管理和流通领域等，前所未有。1995年这些改革得到巩固，一批法规得到建立从此，开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新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 17 年来的历史，人们或许会感到，经济体制改革有丰富内容，目标的择定过程也比较明确；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新似觉模糊，从理论研讨到决策选择都不够清楚。其实，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战略已逐步引起重视。根据各方面形势的变化，先后在几个不同时期，对此都有认真的探索和选择。无论是理论或决策，都有不断的开拓，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段时间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继续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完全必要的。

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国外在 50 年代首次提出，60 年代后得到较普遍的运用，引入我国则在 70 年代末。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前苏东各国在 60 年代即有热烈展开，引入我国也早一些，只是用语不尽相同。之所以到 70 年代末又博得重视，则是为了谋求国民经济的更好发展。人们认为，过去有成绩，也有失误，既有发展战略目标选择上的失误，也有实现战略目标方法、方式上的失误。“在经济发展战略

目标的选择上，或多或少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①至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方法、方式上的失误，具体表现在：(1) 在生产建设上，片面地追求产值的高指标，而忽视经济效益；(2) 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3) 扩大再生产单纯地依靠上新的基本建设项目，忽略了充分发挥原有企业的作用，不重视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4) 片面地追求像钢铁等重工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的产量，严重忽视最终消费品的生产；(5) 片面追求高积累，挤了人民必需的消费；(6) 片面地强调人多好办事，对人口增长缺乏控制，吃了大亏；(7) 片面地理解自力更生，实际上搞闭关自守，造成了不少本来可以避免的浪费；(8) 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脱离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的程度。^②以上所指出的 8 方面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更新，如果还走老路，后果肯定是不好的。

80 年代初期，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对外经济关系和理论与方法等四个调查组，集中一批专家学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过去数十年间采取了一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增长率虽然不低，但是缺乏成效。当这种战略发挥到极致时，就会出现“大跃进”和“文革”一类灾难。所以在制定“六五”计划和 1980—1990 十年规划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出路

马洪：《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14 页。

^② 同上书，第 14—15 页。

在于实行从外延（粗放）增长方式到内涵（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指出：外延增长方式乃是集中计划经济的产物，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体制。^①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曾经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一项主要内容来看待。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一书中，曾有专门一节论述“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②其中谈到：“实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战略目标，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使我国的经济从外延方式为主的发展逐步走向以内涵方式为主的发展，并把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当然要重视利用外延因素来扩大再生产，特别是一些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建设初期，可以主要依靠外延方式。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逐步把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特征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还研讨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依据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正确处理新建扩建和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关系？二是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是否与重点建设相矛盾？三是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是否与解决劳动力就业相矛盾？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实现外延和内涵两种方式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结合，而且可以促进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使我国经济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上述理论的开拓，也源于建设实践的进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发展在战略和增长方式的选择上有过

① 参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综述”，《改革》1995年第6期。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8页。

几次转变，但在实践中又有过若干反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后，1977—1978年国民经济有了初步回升。但是在制定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时，又重犯片面追求高速度并导致高积累的错误，把所需资金寄托于大量举借外债、大规模引进项目上，脱离当时的国情国力，搞所谓的“洋跃进”。不久，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这次调整提出12项措施，一方面要把失调的经济结构调整过来，另一方面要从思想领域清除“左”的影响。调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目的是为了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含有积极意义，不同于60年代初的“八字方针”。

1981年底，召开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明确指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且强调：“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条新路子就是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传统的不同就在于：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提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十条方针：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讲究生财、聚财、用

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是新“八字方针”的充分体现，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之所以到那时才能比较系统、具体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过去的实践还不够，以致人们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做出应有的判断和结论。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长过程。

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这次会议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奋斗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不仅是实现总产值的翻番；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落脚点，不是为翻番而翻番。在这个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使用经济发展战略的术语，规定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同时，这个文献还规定在发展的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后来，把工农业总产值改为国民生产总值，把前十年翻一番的任务明确为解决温饱，连同实现小康和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二、三步战略目标，有步骤地实现基本现代化。

其实，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重要文献中，都不止一次地从各种角度提出过和强调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就要求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进一步强调：“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些说法，虽然重点和侧重面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表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方针路线上，党和政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下了极大的决心，并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希望和期待着得到逐步的实施，达到既定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应当承认，贯彻新的“八字方针”以来，在 1984—1988 年围绕“六五”和“七五”计划总的情况是好的表现在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保持了较快的速度；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较好，基础产业得到加强；出现了有限的买方市场势头，形成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城乡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改善。但是也要看到，在此期间，经济的效益和质量，正如每年和每季度分析经济形势时所用的新闻辞令，始终是“不够理想”。1992 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综合经济实力加强。然而在此前后，又出现了两次不小的周期波动。第一次在 1988 年后，第二次在 1993 年后都是由于速度过快、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经济过热。针对第一次过热，实行治理整顿，有所缓解；但是开始过严，致使一度出现增长滑坡。针对第二次过热，加强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努力，初步接近“软着陆”。在此期间，突出的矛盾是出现通货膨胀连续三年到 1995 年还攀高在两位数，有待继续抑制。对这两次周期波动，有过不尽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是

由于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所致，主张重新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办法；有人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惯性使然，只有以转变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有可能逐步根治上述经济痼疾。17年来的实践已清楚地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只有这样，国民经济才能逐步走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改革和发展的联动及双重模式的转换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新，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一般地说，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也就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前者对后者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改革与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有人譬喻为鸡与蛋，谁生谁，像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形成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循环。

同时必须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必须有良好的经济环境，这又与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为了使多数人在改革中得到实惠，增加改革动力，减少改革阻力，应当在改革进程中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使消费基金不断增长，否则群众不会拥护和参与改革；二是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创造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为了使竞争能在正常的环境中进行，应当保持市场的稳定运行，否则如果过热，出现通货膨胀，价格信号混乱，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不少改革措施就难以出台。为此，我们主张“渐进”方式，或者叫做“双向